

JIS

第2卷
2023
第5期

第2卷
2023
第5期

智能社会研究

Journal of Intelligent Society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

哈尔滨工程大学主办

智能社会研究

Journal of Intelligent Society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



杂志公众号二维码
官网网址 www.jis.ac.cn



ISSN 2097-2091

9 772097 209239

定价：45.00 元

ZHINENG SHEHUI YANJIU

目 次

特 稿

数字神 斯拉沃热·齐泽克(1)

《三体》与社会合作 王天夫(38)

论 文

智能社会研究:发展与展望 周 凡(59)

研究报告

数字社会中的青年婚育观念 王安迪 闫誉腾 李 婷(84)

译 文

城市数字基础设施、智慧城市主义和传播

——城市数字规划所面临的研究挑战

..... 斯科特·麦奎尔 著 蒋效妹 译(111)

超越智慧城市:面向 21 世纪城市的传播议程

..... 斯科特·麦奎尔 著 褚传弘 译(142)

书评

文化分析视角下的开放技术前景

——评《网络效应:浪漫主义、资本主义与互联网》

..... 谢 榕(173)

数据大舞台,过去和未来

——评《数据区隔:关联、社群和新的承认政治》

..... 张 琦(187)

访谈

数字时代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

——王程韡教授访谈 王程韡 孟皓琪(208)

CONTENTS

SPECIAL REPORT

- The Digital Divine S. Žižek(1)
- The Three-Body Problem* and Social Cooperation Wang Tianfu(38)

THESIS

- Research on Intelligent Society: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Zhou Fan(59)

RESEARCH REPORT

- Views on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among Youth in the Digital Society
..... Wang Andi, Yan Yuteng, Li Ting(84)

TRANSLATED TEXT

- Urba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Smart Cityism,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hal-
lenges for Urban E-Planning
..... written by S. McQuire; trans. by Jiang Xiaomei(111)
- Beyond the Smart City: A Communications-Led Agenda for Twentyfirst Century
Cities written by S. McQuire; trans. by Chu Chuanhong(142)

BOOK REVIEW

The Open-Ended Prospects of Technology under Cultural Analysis: A Book Review on *The Net Effect: Romanticism, Capitalism, and the Internet* Xie Rong(173)

Data Produces the Future Through the Synthesis of the Past: A Book Review on *Discriminating Data: Correlation, Neighborhoods, and the New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Zhang Qi(187)

INTERVIEW

STS Research in the Digital Era: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Wang Chengwei Wang Chengwei, Meng Haoqi(208)

文化分析视角下的开放技术前景^{*}

——评《网络效应：浪漫主义、资本主义与互联网》

谢 榕^{**}

摘要：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思考技术—社会关系提出了新挑战，文化分析与技术建构论或能提供智识上的分析支点。《网络效应：浪漫主义、资本主义与互联网》一书，按时间顺序考察了早期微型计算机从军工联合体制度下大型计算机中脱胎的过程，以及第一代互联网所带来的浪漫主义与个人主义理念的复兴，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文化遗产与使用者体验推动技术与时代精神互动的技术社会史。个人观念、公众愿景以及价值观与共同文化在技术变迁中的能动性，能够拓宽技术社会前景这一议题的讨论视野，将人、社会关系、理想技术形态等期许纳入进来。

关键词：计算机 互联网 网络效应 浪漫主义

目前，“人工智能”一词似乎仍然与对不确定的兴奋和对未知的期待联系在一起。然而，如果我们环顾四周，就会发现它已经以各种角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工具，如实时传译、无人驾驶、机器人客服等。到 2022 年末，ChatGPT 这一人工智能语言模型的问世完全将对这一新技术未来意义的思考摆在了公众面前。它在短时间内

^{*}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数字技术赋能与青年新型职业实践研究”（项目批准号：2023lzjbkydx02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谢榕，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吸引了大量用户,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讨论,并持续发酵,OpenAI 公司创始人山姆·阿尔特曼(S. Altman)的经历成为这个信息时代新英雄的焦点。

作为 2023 年的绝对科技热点,ChatGPT 所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被技术精英们视为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的象征,不论是在商业上还是在哲学上。确实,技术突破往往预示着新的社会生态的到来,未来人与机器的关系更加令人兴奋而又充满迷离。商人和科技精英意气风发,而一些知识分子和受到就业机会威胁的劳动者则充满担忧。机器智能仿佛一个新的历史分水岭,人们在狂欢中不断提醒彼此,如果不对其采取行动(拥抱或制止),就会失去什么。实际上,这种希望和焦虑的混合感对人类来说并不陌生。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学者们就围绕互联网是否会为公共生活带来活力展开了争论;而在 90 年代,新卢德主义者(neo-Luddites)已经对计算机技术占领工人就业领域发起了抨击。今天,我们似乎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

回顾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冷静下来,在更理性的框架下审视人工智能与未来世界的面貌。刚刚过去不久的计算机和互联网通信革命是一个最佳的分析支点。从军工技术到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应用,计算机与互联网是如何成为今日之模样的?一个新技术的发明是否会“断裂式”地开启一段新的历史?抑或某些“伟大突破”时刻只是后人的想象?社会、文化、人类的理性与情感以何种态度接纳技术?

美国佛蒙特大学社会学家托马斯·斯特里特(T. Streeter)在其著作《网络效应:浪漫主义、资本主义与互联网》(*The Net Effect: Ro-*

manticism, Capitalism, and the Internet,以下简称《网络效应》)中采用的建构主义思路,也许能够帮助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迎接人工智能的挑战。技术建构主义观主张技术的演进并非仅受其固有属性的制约,而是在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政治动态以及经济格局的共同作用下被塑造和发展的。换言之,技术的含义与应用是在持续的社会互动过程中不断构建和重新定义的,映射出对人类行为、决策过程和价值观的深层影响。斯特里特的研究超越了对技术本质的直接探讨,而是将其嵌入更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深入探究技术在资本主义框架、文化实践和日常生活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这种叙述逻辑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从军事想象到个人解放:计算机通信变迁历程

众所周知,计算机通信的出现最初是受国防资金支持的,早期互联网只在小圈子内使用,TCP/IP也不是20世纪80年代唯一的网络协议,人们认知中的通信技术出现与扩散的过程其实被大大简化过了。斯特里特的目的并非展开叙述互联网诞生的简史和大事年表,而是提请我们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去审视当今信息技术的面貌。人们对技术发明的想象总是与科学家、实验室、早期设计者等联系起来,仿佛技术从发明到普及直至最终改变生活的过程,是被某个主体有意识、有目标地推动的。然而“技术扩散”并非字面意义上看起来是一个传播过程,它不是朝某个特定方向推行的,而是在社会理想、理性思辨与符号观念环境中徐徐展开的。

技术的意义是被人们根据某种语境赋予的,这一意义不断塑造

着技术的样貌——这句话大概是对斯特里特观点最简洁的总结。我们选取计算机从军事工具向个人化操作工具的变迁过程的论述作为例证,来理解斯特里特的这一洞见。

(一) 计算机的“身份”变迁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联网台式机并不是 20 世纪 60 年代那些大型计算机的直接衍生物,反倒是对它及它所代表力量的一种反抗。(斯特里特,2020:39)

通信网络的起源总是被追溯到冷战时期,多进程、计算机网络互联、屏幕呈现的图形化都是符合军事控制意图才出现的技术创新,然而完全将互联网视为“打赢核战争”需求的神话其实过于简单了。的确,互联网得到了冷战机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资助才被创造出来,但它更主要是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技术发展路径与政策的产物(微波炉、喷气式飞机等也一样),即公司自由主义这一政治经济思想潮流的症候。公司自由主义主张由政府推动开展高风险研究并转化为产业和商业上的应用,这种政企合作、公私合作的融合经济一时间催生了不少技术成就,被称为“军工联合体”(斯特里特,2020:45)。这一政策下产生的计算机遵循回答问题、处理数据、协调组织人类事务的理性与技术统治逻辑,追求一致性与可预测,带有大型企业的组织化气质。然而,美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是对大政府、大公司的怀疑和不信任,这意味着公司自由主义模式必然面对矛盾的境地,也正是这种矛盾促使计算机的“身份”经历了从工具理性向浪漫主义个人化的转向。

对于早期商用的昂贵大型计算机以工具理性为逻辑、所有人和事都依据固定规则实现的特点,文艺作品赋予智能以“残忍”色彩(斯特里特,2020:49)。直到人机互动偶然出现,操纵计算机的体验使这一技术内部开始逐渐生发出截然不同的逻辑。计算机越来越常见(尽管仍是大型机器),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种新的使用方式逐渐显露,它更多被用来分类、组织、操作符号而非运行复杂计算。不久,IBM引领的计算机产业引入了“集中文字处理中心”的概念,这使得计算机成为办公自动化的基础,人们开始设想庞大的计算机总有一天会与终端前的“新秘书”共同工作,就像在工厂中那样。一些大众媒介和技术精英预测,这将会改变传统的工作组织的科层制架构。除了愿景,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中一台名为“旋风”的实验计算机由于首次实现交互式处理而令其操控者第一次感受到了“玩”计算机的经历。这一体验被互联网先驱约瑟夫·利克莱德(J. Licklider)敏锐地捕捉住,并付出努力将“人机互动”置于一个合法化的框架中。他告诉人们,与计算机的互动可以节省工作时间,一旦计算机成为“人的能力的延伸”,它就成了可会话的奴隶、可互补的同事、愉悦感的来源,甚至被预测为可在家庭中使用,帮助市民参与政治进程。交互与赋权的使用体验,使得人们对计算机“理性控制机器”的想象开始松动。接着,计算机反文化思潮进一步推动计算机合法化的理由从宏观管理向个人化工具转变。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充满着不满,小型斗争充斥在工作与家庭场所,女性主义观点在出版物中涌现,办公室管理摩擦频发,城市冲突率上升……拒斥控制式传播、呼吁民主沟通的诉求在现代

传播系统中成为突出的问题。这种文化环境悄然改变了人们对计算机的理解,计算机的控制角色与沟通角色之间的张力也越发明显。帕克研究中心的工程师(他们受越战引发的文化危机的影响)延续了利克莱德的思路,认为计算机通信应当逐渐由用户控制而非控制用户,军官的俯视视角应当被用户个体的视角所替代,于是开始在设计中引导计算机互动属性的增强。大学师生、工程师、科学家这些最先受到反文化政治运动影响的群体,开始以行动实现一种自由、反文化的生活方式(如程序员穿运动鞋、佩戴反战胸针汇报工作)。这些生活方式昭示了巨大的文化转型,也昭示了对计算机的认识的转变。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计算机就摆脱了“军事”形象。其间,各种作品或媒介——如计算机科学家约瑟夫·威兹伯姆(J. Weizenbaum)的《计算机权力与人的理性》、泰德·尼尔森的(T. Nelson)《计算机解放》、《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等——对计算机宏大、非人性的使用方式进行了批判,强调个人创造与自由的重要性,这一浪漫主义观点推波助澜,其中一些轻快、趣味、刻薄的语言风格重新书写了科技的形象;先锋艺术家开始将艺术色彩与工程技术观结合起来,甚至艺术家和科学家的身份也可以融合在同一个人身上;“计算机迷”群体被识别出来,代表了计算机用来找乐子、寻刺激的功能,用计算机“冲浪”的说法便始于此时(斯特里特,2020:91)。

(二) 微机普及下的社会修辞

通过提供对计算机浪漫主义式的使用方法……计算机的使用和设计不再是同特定目的相连的途径,它们就是目的本

身。(斯特里特,2020:75)

在上述文化观念转型下,“个人计算机”一词出现并最终落实在微型计算机(简称“微机”)的创造和普及上。最早的微机归功于社群而非个人发明家,计算机爱好者组成的自愿群体[比尔·盖茨(B. Gates)、史蒂夫·乔布斯(S. Jobs)都曾这类群体的成员]最先开始利用廉价芯片进行发明创造。第一台用于销售的流行计算机上市后开启的工业进程普及了互动式计算,生动诠释了文化潮流与技术变迁之间的关系。计算机自此成为帮助人们实现创造性、自我探索与表达的技术,成为一种反文化技术的代表,人们购买计算机不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而只是单纯地看看它能干点儿什么,苹果 II 便宜的价格允许消费者只是玩玩电脑。计算机大会、个人计算机展、计算机粉丝大会等狂欢式反叛文化蔚为大观,计算机不再是工具而是目的本身——这一观念已被广泛接纳,从业者、使用者的认同与关系也开始被重新思考。

如果说专家圈子是推动计算机个人化的先锋,那么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美国社会对市场个人主义策略合理化的需求,则成为 90 年代微机真正进入主流消费领域的宏大社会语境。

盛行于 20 世纪 30—60 年代末的凯恩斯主义曾将美国从经济危机后的萧条中解救出来,维护了世纪中期美国的经济稳定与增长。70 年代开始,通货膨胀与经济滞胀等问题出现,市场个人主义的呼声卷土重来。然而,市场自由主义模式要替代现有有权势的思想、重新获得认可与合法性需要经历一个过程,技术在其中就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经济保守派首先要做的是在大学和文化领域发起

运动,夺回知识的权威性,以哈耶克(F. Hayek)为代表的学者、芝加哥《法律和经济期刊》等出版物完成了这一使命;而略显过时的军工联合体中企业和政府的亲密关系不再必要,计算机得以趁机从通信垄断公司(如 AT&T)的监管镣铐中挣脱出来。

与此同时,信息社会理论的修辞也向资本主义力量靠拢,符号经济、数据与文化产品的重要性被丹尼尔·贝尔(D. Bell)、马克·波拉特(M. Porat)、阿尔文·托夫勒(A. Toffler)等人强调;人们被告知,电子分发式信息不久就将代替传统工业产品成为主要的商品和资产。以信息通信社会、电子技术决定论为内容的“电子至上修辞法”在话语空间内为互联网和电脑技术争取了一席之地。这一修辞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一拍即合,型构出一种高科技文化。80年代之前,普通美国人无法想象拥有一台计算机,它被视作大型工具来承担中央控制的功能;但随着微机在爱好者圈子里快速扩散,计算机逐渐被解读为个人探索和自我表达的媒介,与之前主流观念形成鲜明对比。这种转变不仅反映了计算机文化中非正式知识与主流媒体的相互作用,还体现了计算机在个人与社会生活中新角色的确立。计算机文化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观念相融合,共同塑造出一种新的高科技文化符号。在这一文化中,计算机不再是理性工具,而是创造力与趣味性的象征。在公众那里,购买计算机所需的知识逐渐突破非正式渠道,主流媒体和新兴杂志开始发布以企业中层、小商人为目标的计算机广告,“制造需求”的文案也从激发好奇心过渡到制造“不买就晚了”的紧迫感;直到抢购高峰开始出现,兜售计算机相关产品的广告随处可见,用计算机来处理文字和表格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在此风潮中快速兴起的微机产业(如苹果、微软等)作

为市场优势的象征符号,终成新自由主义重振信念的有力论据:企业家首创精神与相互竞争才是商业世界兴盛的源泉。那些购买了计算机的用户们呢?他们在使用微机的体验中产生了一种与新自由主义经济视野一致的感受,即个体能够不依赖他人而经营自己的世界,理性计算并掌控自我:可以在家中或办公室拥有计算机这样一个现代技术奇迹;花一些功夫但不太费劲就可学会基本操作;通过操作计算机处理数据、解决问题、探索与表达……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计算机用户的自我认知方式。最终,微机的个人化既是政治经济局势转变的结果,也为这场辩论在心灵习惯层面的转变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二、网络效应:技术与文化的边界融合

与某项新技术有关的人(他们有意识、有目的)在使用、体验和感知这项技术的时候,所滋生出的有关这项技术的理念和愿景,反过来会塑造这项技术的使用方式,进而塑造该项技术的社会功能。由技术、开发者、众多使用者形成的网络会对该技术的扩散和渗透产生效应,或者说某项技术落地后会受到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中各种主观力量的塑造。简单回顾作者的叙事模式后我们可以看到,书名中的“网络效应”并非指互联网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网络”是由某项新技术及其周身环境中的不同主体(国家政策、市场、文化传统等)构成的,这些主体的承担者是人类行动者,他们或以技术工程师、黑客等身份实践技术的新用法,或以用户期待的方式唤醒或传播浪漫主义的文化记忆,或作为政策制定者改变市场环境,又或以

技术或文化精英的身份“预测”技术走向并产生影响……计算机与互联网作为新鲜变量影响着围绕它形成的网络中的人和文化,同时也被人和文化所塑造,即“网络效应存在于它自身产生的过程之中”(斯特里特,2020:21),对所有涉身其中的主体实现反馈。其中,该书尤其强调浪漫主义文化的角色,它以计算机工程师中亚文化的形态、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氛围中与控制和理性决裂的修辞、以激发公众对计算机个人化流行想象的作家为实现方式,使得计算机与互联网成为今日之模样。诚然,文化风格并不能凭一己之力塑造技术的社会角色,但浪漫主义的确一边通过反文化主题的活跃和传播确定了计算机通信革命发生的历史阶段,一边将个人电脑与互联网整合进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知识分子富有洞见的著作、热门杂志的宣扬、个人对官僚控制风格的天然逃避,以及潜在用户在当时社会中的共同文化的体验,都是浪漫主义被操作化的方式。

正因如此,该书既是一部技术社会史,又是一种以计算机通信为案例的文化研究著作。沿革自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化传统,在21世纪仍然以相似的方式实现它的内涵。“文化”一词本来就带有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意涵(威廉斯,2018),如何在专业化与共同文化间找到契合点以趋近民主,如何约束技术的特权保证人们互相之间的责任与团结,是自雷蒙·威廉斯(R. Williams)以来文化研究的使命。斯特里特的这部技术文化著作好像疏解了文化研究使命的紧张感:不用刻意强调技术对文化的压制,技术本身就是文化观念选择的产物。如果说文化是对自然生长的扶持,那么计算机技术就是它扶持的众多对象之一。斯特里特的观点之所以在一

众“技术焦虑”论调中显得如此从容,有赖于他所秉持的技术社会建构论立场,而浪漫主义便扮演着具有持续性、有效性的社会建构力量之来源。

与“文明”相对应的“文化”总是回应其他理性、官僚式的思维模式,帮助人们有能力“站在常规的职业道路、政治行为和资本进程的对立面”(斯特里特,2020:257)。浪漫主义的这种姿态正是人们长期处于围困状态下的自然心态——一种“防御态度”。正因如此,作者称浪漫主义是回应性的(斯特里特,2020:256),它总是在我们被困韦伯式“铁笼”里时才以解困者的姿态出现。可以说,如果工具理性祛魅后的世界充满了技术化和官僚化,那么浪漫个人主义则是“复魅”以重新找回个体创造性与愉悦的寄托。同时,新技术与用户“磨合”的过程也为浪漫主义文化本身提供了素材:与计算机互动而产生的强烈兴趣、上瘾和兴奋感正接合了浪漫主义对不可预测性的主张和对内在经验独特性的声明。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我们再次感知到浪漫主义文化的触角。艺术家和年轻人通过 AIGC 生成旋律、创作讽刺性绘画或具有调侃性的文本,创新与个性化的表达需求得以体现,并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展现出更加宽广的创作空间。这表明,人工智能不只是算法和编程的集合体,它最终呈现的是用户的价值取向。这种技术不仅重塑了传统创作过程,也重新定义了创新的内涵;由于易操作性与大众可见性,生成式人工智能还可能是技术民主化的可能契合点。如果说文化是对自然生长的扶持,那么人工智能产出的文化产品就是这种扶持的当代表达之一,它模仿和增强了文化产出过程,引发了对人、自然与技术界限的深刻思考。

三、结语

《网络效应》在智识上回望过去不久的技术社会史,在宽广的视野上复盘历史上发生过的科技突破与变迁,帮助我们将向前眺望的视野与过往经验的思路连接起来,带着人类曾经的理想、思辨和企盼审视当今又一次的科技更新。如今,ChatGPT 在公众话语中如同当年的苹果手机一样,好似已经为开启一个新的人类时代蓄势待发,仿佛天才的决断和天赋所成就的新技术将要惠泽天下。然而正如计算机案例告诉我们的,技术创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社会化过程,生成式人工智能究竟如何嵌入社会,涟漪散尽后的双方呈现何种样貌仍是有待发现和讨论的。据已经可见的事实,以 ChatGPT 为代表的技术产品已经展露出浪漫主义理念的当代表达,ChatGPT 能够在与人类的互动中生成富有深度情感和艺术美感的文本,这些文本不仅是算法的成果,更是对人类对于美、自然以及个人情感表达渴望的一种回应。ChatGPT 提供的平台能够让用户自由地与之互动,探索和实现个性化的创意,这种互动拓展了人类追求超越日常现实、探索更多可能性的通道。

“有无数技术的故事,为了一个目的开始,又结束于另一个目的。”(斯特里特,2020:40)许多技术最终实际的社会功能与它最初被发明和设计时的目的并不完全相同,因为技术的发展和扩散并不独立于社会过程。技术的潜能是由社会语境书写的,在这个语境中,科学共同体、亚文化群体、商业主体、市场规则乃至技术使用者,在时间的推移中应时发挥自己的作用,相互间形成了复杂的互动,

弥散于形构技术的“空气”中。斯特里特对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历史模式进行了回顾,改变了技术本质的客观物的形象,提醒我们技术在本质上是“形成”的过程。

对于人工智能浪潮,使用者体验、围观者期待、公众想象乃至传统文化观念,都是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最终形成其技术“身份”并固定下来的关键变量,也是我们应当对这一技术保持开放视野的理由。我们将科技产品与传统文化、技术统治与政治决断之间的抗争与融合过程都纳入视野后,就不仅可以丰富技术史的书写,也可以更有理由开放地期待未来人工智能与技术使用者的互动方式。这也正是为何人们谈及人工智能时总是兴奋的,因为我们在思维惯性上预设了新技术必定因其探险意识与再塑造倾向而与“解困”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我们关于互联网浪漫故事的记忆仍十分清晰。倒不必急着呼吁让这种期待冷却下来,也许正是基于某种共同文化的公众期待才能引导技术的样貌向着特定方向发展过去;那些真实地使用一项新技术的人的精神体验(满足、震惊或威胁感、梦想与期望),也许将会继续塑造智能技术尚未形成的样貌。正如斯特里特所说:“互联网是开放的,并不是因为技术本身……而是因为它将它叙述成是开放的,最终,我们信奉它,并将它建设成为开放的。”(斯特里特,2020:262)

这本书直面技术与文化交织的复杂性,还原了真实世界中技术物的使用与人类期许的混合形态,带领和启发我们通过考察技术发展背后广阔的历史模式,去探求特定的技术创新与社会因素间复杂的互动,以此透过技术潜能与社会语境二者的交叉滤镜去思考技术创新的可能前景与方向。

参考文献

- 斯特里特,托马斯,2020,《网络效应:浪漫主义、资本主义与互联网》,王星、裴苒迪、管泽旭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威廉斯,雷蒙,2018,《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编委会主任：高岩

编委会副主任：夏桂华 赵玉新

吕鹏（中国社会科学院）

编委：尹航 冯仕政 冯全普

（按姓氏笔画排序）吕鹏（中南大学） 吕冬诗

朱齐丹 汝鹏 苏竣

李正风 来有为 肖黎明

邱泽奇 何晓斌 宋士吉

陈云松 陈华珊 郑莉

孟小峰 孟天广 赵万里

赵延东 胡安宁 袁岳

黄萃 梁玉成 董波

曾志刚 蔡成涛 璩静

青年编委：丁奎元 王磊 叶瀚璋

（按姓氏笔画排序）邢麟舟 向维 刘灿辉

刘松吟 刘春成 刘晓波

安博 许馨月 孙宇凡

李子信 李天朗 李晓天

吴雨晴 何丽 邹冠男

张咏雪 张承蒙 陈茁

陈典涵 林子皓 周雪健

周骥腾 郑李 胡万亨

茹文俊 贺久恒 贾雨心

郭媛媛 黄可 梁轩

曾晨

编辑团队

主编：郑莉

编辑部主任：吴肃然

编辑部成员：林召霞 王立秋

李昕茹 李天朗

岳凤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主办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

出版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

出版社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

南通大街 145 号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2097-2091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23-1615/C

印刷单位：哈尔滨理想印刷有限公司

创刊年份：2022 年

出版日期：2023 年 9 月 10 日

发行单位：哈尔滨市邮局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电局

邮发代号：14-375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定价：45.00 元

投稿指南

本刊面向海内外学者征稿，欢迎社会科学及交叉学科的专家学者惠赐稿件。请在来稿首页写明文章标题、作者简介（姓名、工作单位全称、联系电话、详细通信地址、电邮地址等）。文稿需完整，包括标题（中英文）、作者姓名、作者单位、摘要（300 字左右）、关键词（3—5 个）、正文、参考文献等。所投稿件如受基金资助，请在标题上加脚注说明，包括项目全称和项目批准号。来稿请以中文撰写。

稿件采用他人成说的，须在文中以括注方式说明出处，并在篇末列出参考文献；作者自己的注释均作为当页脚注。中外文参考文献分开列出，中文文献在前，外文文献在后，并按音序排列。中文文献参照中文社会学权威期刊格式，外文文献参照 APA 格式。来稿中的图表要清晰，符合出版质量要求，必要时可单独提供图表压缩包文件。

稿件格式请参考杂志官网（<http://www.jis.ac.cn>）“下载中心”中的稿件模板。

投稿方式：请登录杂志官网投稿系统（<http://www.jis.ac.cn>）进行投稿。

编辑部联系方式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南通大街 145 号哈尔滨工程大学主楼北楼 N301 室，《智能社会研究》编辑部

邮编：150001

电话：0451-82588881

E-mail: mailto:jis@163.com

著作权使用说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等网络知识服务平台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网络知识服务平台的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